

清代闺秀自我书写的矛盾与困境管窥

——以桐城张令仪为例

乔玉钰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 清代女性文学近年来渐受学者瞩目,但现有研究往往集中于江浙女作家,尤其是负有盛名的蕉园五子、随园女弟子、碧城仙馆女弟子等,并强调其结社唱和、拜师交友等文学活动的革新意义。与之相对,安徽往往被推定为地域文化保守,针对当地女作家的研究也较少。本文以桐城张令仪为例,通过分析其作品,展现其自我书写时的矛盾心理,揭示闺秀作家自我意识觉醒,却又无法摆脱传统女德的影响,在“才女”与“贤妇”这两种角色定位中摇摆不定的精神困境;并借此对当下偏重江浙女作家且过分强调其“革新性”的清代女性文学研究予以补正。

[关键词] 清代; 闺秀; 自我书写; 张令仪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16)04-0072-07

清代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最兴盛的时期,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收录女作家四千余人,其中清代女作家三千五百多人。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男性扶持,因而女作家成大名者,多为“名父之女”“才士之妻”“令子之母”。有清一代,桐城文脉之兴盛、文士之杰出无须赘言,在此辐射下,女性文学呈现何种状态?《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清代桐城籍女作家一百三十余人,光铁夫《安徽名媛诗词征略》与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中的文献钩稽,亦体现出桐城女性文学之繁荣。又据美国学者曼素恩(Susan Mann)统计:“江南或谓长江下游,作为一个完整的大地域,产生的女作家多过了清朝女作家总数的70%以上,但是,这个大区域本身看来又可分成一个核心区域,即常州一钱塘一线,以及五个卫星地带,即环绕在周边的绍兴、扬州、南京、桐城和新安。”^①然而现有清代女性文学研究多集中于江浙地区,对桐城少有涉及,且往往推定当地妇女观念保守,如曼素恩认为“是朱熹理学的书院所在,特别注重家法。书院的主要代表方苞是以对妇女观念特别保守著称的”^②,曹晋则评价姚鼐的女德观曰“他对宋明理学的推崇和桐城一贯的礼教之风的习染,形成姚鼐的女德观,这是一种极端的、令人窒息的妇女道德观。”^③加之提及桐城女作家,经由清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近人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和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的丕扬,“方氏三节”最广为人知,其中方孟式为殉夫烈妇,方维仪、方维则则为守寡六

[收稿日期] 2015-10-15

[作者简介] 乔玉钰(1981—)女,江苏徐州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域外汉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女性文学在东亚的接受与影响研究》(批准号:14CZW028);

教育部第四十九批“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明清女性文学在日本的接受与影响研究》。

① 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294页。

② 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③ 曹晋《姚鼐的女德观与清代桐城妇女风俗》,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58页。

十余年的节妇,这就易造成桐城女作家多为节烈妇女的印象。本文拟以桐城文学世家张氏家族的张令仪为例,探究当地女作家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态。

张令仪字柔嘉,号蠹窗主人,生于康熙七年(1668),卒于乾隆十七年(1752)。张英第三女,张廷玉之姊,嫁同邑姚士封,生二子孔奎、鋹。^①现存《蠹窗诗集》《蠹窗二集》收录诗近一千五百首、词八十九首、文十三篇,曾创作戏曲《乾坤圈》《梦觉关》,惜俱亡佚,仅存题辞。另有蒙学书《锦囊冰鉴》,仿效《龙文鞭影》体例,约十八万字,日本内阁文库藏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②无论传世作品之丰富还是创作体裁之多样,张令仪在清代女作家中都堪称翘楚,然迄今尚少有学者论及。本文通过对张令仪作品的分析,揭示其自我书写时的矛盾心理,以及在“才女”“贤妇”这两种角色定位中摇摆不定的精神困境,展现桐城女作家生活与思想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样的矛盾与困境,在江浙女作家身上亦有体现,由此可知传统女德对闺秀的影响根深蒂固,这对当下偏重蕉园五子、随园女弟子、碧城仙馆女弟子等江浙才女,且强调其拜师访友、结社唱和等行为偏离传统女德之“革新性”的清代女性文学研究,亦可起到一定的补正作用。

一、“举案齐眉”中的“天壤王郎”之叹

关于张令仪的婚姻,有如下记载:“抱闺阁中仅见之才,有兼人之德,相夫教子,治家守身,各宗乎礼。始以贵家女而为贫士妇,毫不敢挟财势以骄侈。”^③令仪之夫姚士封字玉笥,号湘门,文熊第三子。张、姚二姓皆桐城望族,本属门当户对,但“幼为张文端所器,以女字之”^④的士封半生困顿场屋,不过一介邑庠生,令仪之父张英与其弟廷玉却是青云直上位极人臣。对这种“贵家女”为“贫士妇”的落差,令仪在自传中写道:“蠹窗主人者,生于华胄,早事梁鸿,颇厌纷华,能甘淡薄”^⑤,以安贫乐道的贤妇孟光自诩,但其作品中,却时见与之矛盾的情绪:“年少轻离别,出户即异乡。缕缕有苦衷,欲言恐君伤。米瓮久告罄,展转愁空箱。相将典菱花,为子治行装”^⑥,“疗饥少脱粟,掩胫无完布。既伤王霸子,有愧梁家姬。感咏北门诗,去去勿复顾。八口苦嗷嗷,待君生涸鲋”^⑦。夫婿屡试不第,糊口四方,令仪虽以王霸妻、梁家姬为楷模,并典当妆奁为治行装,在“八口苦嗷嗷”的窘况下,终不免借《庄子·外物》中“枯鱼之肆”之典,表达了“待君生涸鲋”的抱怨。因其夫拙于生计,令仪终身仰仗娘家接济,且笔下多有实录:“祷佛求医烦老母,燎须煮药赖同枝。外家恩比丘山重,好语儿曹大可思”^⑧,“四十无成累老亲,每怜弱女最艰辛。休言沦落长贫贱,纵得舒眉益怆神”^⑨。身为自幼接受女德教育的闺秀,令仪虽“毫不敢挟财势以骄侈”,但经济上依附娘家,不免对夫妻关系产生微妙影响,当士封再度落第的消息传来,她写下这样两首诗:

秋风送到秣陵船,愁报刘蕢被放还。心力消磨徒半世,梦魂颠倒又三年。悬金自昔难更字,炼石由来可补天。独我闭门风雨候,萧萧黄叶拥阶前。

灯火鸡窗年复年,悔将生计托残篇。先人并少江头橘,季子安能郭外田。荷插欲随陈仲

① 张令仪《独坐感怀》(《蠹窗二集》卷六第13b页)中有“我生五男儿”之语,除孔奎、鋹得以成年外,当另有三子夭折。

② 经笔者目验,共八册,分上、下卷,前有张廷玉、张廷璐、鲁之裕序及张令仪自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抄本,但非足本,不分卷,无序跋,其他图书馆目前未见所藏。

③ 王贞仪《姚母张太夫人传》,《德风亭初集》卷二,方秀洁(Grace Fong)、伊维德(Wilt L. Idema)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第四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④ 姚国祯《麻溪姚氏先德传》卷五“姚士封”条,民国八年刻本,第3b页。

⑤ 张令仪《蠹窗主人传》,《蠹窗诗集》卷十四,雍正二年刻本,第19a页。

⑥ 张令仪《贫家别》(其一),《蠹窗诗集》卷一,第13a页。

⑦ 张令仪《送湘门越游》(其二),《蠹窗诗集》卷一,第16b页。

⑧ 张令仪《病中示长男孔奎,湘门时客山左》,《蠹窗诗集》卷五,第4a页。

⑨ 张令仪《慈大人见背,触处伤心,杂言六章,用以当哭》(其六),《蠹窗诗集》卷五,第9a页。

隐 断机难效乐羊坚。平生不作牛衣泣 此日相看觉黯然。^①

虽无刻意讥讽指责,但字里行间充溢着凄苦失望的情绪。与其夫判若云泥的是,兄弟廷瓚、廷玉、廷璐、廷瑒诸人皆成进士、步青云,这不免加剧令仪的心理落差,甚至不经意泄露对婚姻的不满和对夫婿的轻慢:

先舅翁非庵府君清白传家,嗣息不免有负薪之叹。家贫四壁,地少容锥。十载飘零,等梁鸿之寄庠。三更遶树,逐乌鹊之无栖。已矣王郎,终焉秦赘。岁次甲申,乃严大人相国公致政之二年。于是禄及故人,惠瞻弱女,爰赐宅一区。^②

“秦赘”指富贵人家的赘婿,“王郎”指才能平庸的男子,二者隐喻十分明显。令仪一家得以安居是受父亲荫庇,“已矣王郎 终焉秦赘”之语,未必不暗含对其夫无力供养妻儿的鄙夷。《惆怅吟》中,她又自伤身世,凸显待字闺中与嫁为人妇的不同境遇:

忆昔承欢在谢家,封胡遏末斗才华。清言畅处风生座,丽句吟成笔有花。风里落红分溷席,秋来乳燕各天涯。每当飞雪添惆怅,太傅门庭冷旧沙。^③

才女谢道韞曾鄙薄其夫王凝之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④令仪将娘家比作“谢家”,将兄弟比作封、胡、遏、末,“风里落红分溷席”之句更将兄弟的显达比作花瓣落于茵席之上,而将自己的婚姻比作花瓣落于粪溷之侧,对婚姻的不满和对其夫的鄙薄,与《蠹窗小记》中的“已矣王郎 终焉秦赘”之语是相通的。

张英评价令仪诗“论古有识,用典故精当”^⑤,张廷璐也盛赞其姊“尤喜博览载籍,六经廿一史及诸子百家之书,靡不搜讨淹贯。……识解之卓萃、学问之渊通,虽老生宿儒有不逮者”^⑥,可见张令仪博览群书,且擅长用典,在诗中借典故表现对婚姻的不满和对夫婿的轻慢,应能驾轻就熟。与男作家相比,女性书写虽多以浅白平实、直抒胸臆见称,但具备深厚学养的闺秀通过用典、隐喻等方式将出离妇德的情绪予以委婉记述,也并不少见:因婚姻不幸投水自杀的李媿曾有“所愧襟怀非谢女,敢将天壤怨王郎”^⑦之语;朱静庵“幼颖悟工诗。……以所配非偶,每形诸吟咏”,《篱落见梅》诗中的“可怜不遇知音赏,零落残香对野人”之语,正是对不幸婚姻的隐喻;^⑧女词人徐德惠为陆蘅的《倩影楼词》题辞“鸦性无端猜不准,谁更把、恨笺天”^⑨,借“彩凤随鸦”之典表露对陆蘅之夫的指责;朱菊如有《闺词》云“寒闺人病已经年,夜夜金炉药自煎。深怪邻姬不解事,月明犹唱想夫怜”,“晴窗检点嫁衣裳,千蝶罗裙百宝装。今日秋风团扇冷,误他颜色缕金箱”,沈善宝评曰“味其各作,琴瑟似不甚谐,彩凤随鸦,亦可叹也。”^⑩借助这种较隐晦的书写方式,闺秀作家在传统女德的约束下,为抒发真情实感找到了一条途径。

二、“弄文可罪”焦虑下的才名自矜

热衷扶持女性创作的袁枚曾感慨“近日闺秀能诗者,往往嫁无佳偶,有天壤王郎之叹”^⑪,道韞

① 张令仪《湘门放归感赋》,《蠹窗诗集》卷四,第8a页。

② 张令仪《蠹窗小记》,《蠹窗诗集》卷十四,第7a页。

③ 张令仪《惆怅吟》(其二),《蠹窗诗集》卷六,第10b页。

④ 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下之上《贤媛》,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0页。

⑤ 张英《蠹窗学诗题辞》,《蠹窗诗集》卷首,第2a页。

⑥ 张廷璐《锦囊冰鉴序》,《锦囊冰鉴》卷首,第3a—5b页。

⑦ 李媿《自悼六首》(其一),《犹得住楼诗稿》卷上,李味青编《上海李氏易园三代清芬集》,民国二十九年排印本,第7b页。

⑧ 刘云份编《翠楼集》诸名媛族里“朱静庵”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1页。

⑨ 徐德惠《南楼令》,《倩影楼词》《题辞》,咸丰刻本,第3b页。

⑩ 沈善宝《名媛诗话》卷十,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527页。

⑪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669页。

而下,才女的“天壤王郎之叹”不胜枚举,抛开“红颜薄命”“才命相妨”等宿命论因素,还因为学养深厚的女子能以更客观,甚至更挑剔的眼光审视婚姻,并形诸吟咏。敢于鄙薄“王郎”的女子,自身往往享有博学多才之誉,例如张令仪,不但被其父比作“吾家道韞”^①,甚至被其弟赞为更胜道韞一筹:“昔谢遏绝重其姊,然相传咏絮解围而外,其他不少概见。吾叔姊之博物清词,著作满家,殆有过之无不及矣。”^②由此可见,桐城文士,至少张氏一族并未对女性创作持否定态度,反而积极鼓励,甚至承认女性之才凌驾于男性之上:“三姊于诸昆弟中最为颖异,幼承太夫人之训,组紉之外,兼课以诗。即景命题,藻思绮合。先太傅绝爱怜之。”^③成长于此种家庭的张令仪,非但有“日永闲方觉,书奇读未厌”^④“虽然忘鼎食,颇爱弄柔毫”^⑤“检点生涯三径菊,消磨岁月一床书”^⑥等热衷文墨之语,亦不时流露对文才的自矜:

此壬寅早秋,清河诸昆季讲仙于修堂。有女仙降坛,自书“姑苏碧筱”,作诗数首。有问者,亦不甚酬对,但书“索蠹窗主人和”。予何人,斯乃蒙仙灵见知。读其诗意,沉郁悲思,似不得志而没者。因感其意,谬和五首。^⑦

女仙降坛,对在座诸人皆“不甚酬对”,独向张令仪索诗。令仪虽自谦“予何人,斯乃蒙仙灵见知”,但郑重记录此事,是感知己之意,亦是自我彰显。晚年之作更明确表露对己作的珍视和传之后世的期望:“寿命原非金石固,一朝仓卒欲言难。无多身后残诗卷,莫作他年覆瓮看。”^⑧

然而,自古有“女子弄文诚可罪”“妇言不出于阃”之说,清代虽为女性文学鼎盛期,涌现出一批提携女作家的文人,但对女子吟风咏月、征诗刻稿持反对态度者亦大有人在,其中代表如章学诚对袁枚及其女弟子的大肆抨击:“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感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卷,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⑨在这种环境下,女作家虽期望作品博得赞誉、传之后世,又畏惧来自传统道德的非难,写作时承受着心理压力。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清代女作家使用最多的集名为“绣闲”和“绣余”,达一百四十部,以“红余”“织余”“纺余”“纛余”等名集者,又有数十部,这是她们的辩解和韬晦——写作仅为余暇之消遣,不曾影响刺绣纺织、操持中馈等“正业”。某些女作家甚至因吟咏“非妇人事”而焚毁诗稿,如韩菼之女韞玉“少承家学,博极群书”,“病歿前,取稿尽焚之,曰‘非妇人事也’”。^⑩即便将作品付梓,也不忘申明女子作诗合乎正统道德:“昔孔子删诗,不废闺房之作,后世乡先生每谓妇人女子职司酒浆缝纫而已,不知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之下,继以妇言,言固非辞章之谓,要不离乎辞章者近是。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⑪、“《三百篇》中,大半出乎妇人之什……使大圣人拘拘焉以内言不出之义绳之,则早删而逸之矣”^⑫。除借助儒家经典为女性创作正名外,慰藉愁苦、垂训后人也是常见说辞,前文提及,张令仪编有《锦囊冰鉴》一书,她曾在诗中自述沉迷编写、疏懒中馈的经历:

著书忘岁月,长日掩萧斋。与世原无意,临风且放怀。紫兰依片石,红药傍闲阶。莫漫愁

① 张英《寄三女》诗云“稚女关情久别离,吾家道韞解吟诗”,张英《笥素堂诗集》卷二,康熙刻本,第10a页。

② 张廷玉《锦囊冰鉴序》,《锦囊冰鉴》卷首,第4a-4b页。

③ 张廷玉《蠹窗二集序》,《蠹窗二集》卷首,乾隆八年刻本,第1a页。

④ 张令仪《幽居杂咏》(其二十九),《蠹窗诗集》卷七,第12a页。

⑤ 张令仪《幽居杂咏》(其十九),《蠹窗诗集》卷七,第10b页。

⑥ 张令仪《秋日闲居》(其二),《蠹窗诗集》卷三,第1b页。

⑦ 张令仪《步姑苏女仙碧筱原韵五首》诗后自注,《蠹窗诗集》卷十二,第6b页。

⑧ 张令仪《病起口占示两儿》(其二),《蠹窗诗集》卷十,第13b页。

⑨ 章学诚《丙辰割记》,《章学诚遗书》外编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99页。

⑩ 完颜恽珠《正始集》卷四“韩韞玉”条,道光十一年刻本,第19a页。

⑪ 完颜恽珠《弁言》,《正始集》卷首,第1a页。

⑫ 骆绮兰《听秋馆闺中人集序》,转引自《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第940页。

中馈,开奁捡凤钗。^①

而该书付梓之际,却在序言中辩解道:

予学惭韦母、才愧班姬,加以尘务经心、识见非广,聊凭臆度,丛杂无章。或篝灯绩火,风雨晦明,课稚子琅琅诵读一过,如晤对古人,庶几愁苦稍释耳。诸弟见之,谬加奖与,请付梓人,公诸同好。嗟乎!谢道韞之解围,无其高朗;李易安之赌茗,乏此清闲。仅同王霸之妻,为农而没世;大似老莱之妇,偕隐以灌园。身既隐矣,何用名哉?盖欲以劝诱童蒙,非敢质诸当世也。^②

刻意否定自身才华,解释该书编写乃至付梓始末,反复强调“身既隐矣,何用名哉”、“欲以劝诱童蒙,非敢质诸当世”,这固然是一种自谦的姿态,但以韦母、班姬为楷模,虽欣羨才女谢道韞、李清照,最终却声明自己践行的是王霸妻、老莱妇之德。虽有“无多身后残诗卷,莫作他年覆瓮看”的期许,却又有“欲语知无味,人前口重缄”^③的审慎,更声言“身后诗千首,枕中书一函。放言聊寄慨,他日任芜芟”^④。这正体现了女作家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热衷写作、自矜文才,却又不得不韬光养晦的复杂心态。

三、突破性别限制的尝试与幻灭

由于受“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传统的深远影响,古人写作诗文往往较为慎重,男性文人因不便直言“毁谤君上”,通常使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而女作家在“弄文可罪”的心理压力下,更不愿在诗文中留下背离妇德的口实,无论对才名的自矜还是对婚姻的不满,多借用典、隐喻等方式予以委婉表露,前文诸例皆可证。相比诗文,戏曲创作带有游戏色彩,所受道德束缚较少,这就为明清女作家“提供了较为自由与开放的欲望想象空间,成为她们表现与完成自我、想象权力、介入社会、针砭现实及寄托理想之重要媒介”^⑤。清代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她们借剧中主人公言己所不能言、为己所不能为,在“角色扮演”中进行了突破性别限制的尝试。

张令仪曾创作戏曲《乾坤圈》和《梦觉关》,虽俱已亡佚,但依据《蠹窗诗集》中所存题辞,仍可窥见二剧大致情节及主题思想:

造物忌才,由来久矣。自古才人沦落不偶者,可胜言哉?至若闺阁涂鸦,雕虫小伎,又何足道?必致穷困以老,甚而辘轳失意,颠沛流离,岂非造物不仁之甚与?……蠹窗主人偶于长夏翻阅唐诗,因感黄崇嘏之事。……因叹崇嘏具如此聪明才智,终未竟其业,卒返初服。宁复调朱弄粉、重执巾栉,向人乞怜乎?故托以神仙,作闲云高鸟,不受乾坤之拘缚。乃演成一剧,名曰《乾坤圈》。使雅俗共赏,亦足为娥眉生色,岂不快哉!^⑥

予偶阅稗官家所谓《归蓬梦》者,见其痴情幻境、宛转缠绵。几欲随紫玉成烟、白花飞蝶。忽而明镜尘空,澄潭心彻,借老僧之棒喝,挽倩女之离魂,得证无上菩提,登彼觉岸。于是芟其芜秽,编为剧本。名之曰《梦觉关》。^⑦

明清时期据黄崇嘏传说改编的文学作品中,最著名者当推徐渭《四声猿》中的《女状元辞凰得凤》,剧中黄崇嘏表明女子身份,虽回绝了与长官周庠之女的婚配,最终却辞官回归闺阁,嫁与周庠之子。张令仪是否读过徐作难有确证,但据“因叹崇嘏具如此聪明才智,终未竟其业,卒返初服。宁复调朱弄粉、重执巾栉,向人乞怜乎”的表述,可知她并不赞同才女一生困守闺阁、成为男子附庸。

① 张令仪《闲居杂咏》(其九),《蠹窗诗集》卷七,第9a页,原诗后有自注“予著有《锦囊冰鉴》一书”。

② 张令仪《锦囊冰鉴序》,《锦囊冰鉴》卷首,第2a—2b页。

③ 张令仪《幽居杂咏》(其二十九),《蠹窗诗集》卷七,第12b页。

④ 张令仪《幽居杂咏》(其二十九),《蠹窗诗集》卷七,第12b页。

⑤ 华玮《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13—14页。

⑥ 张令仪《乾坤圈题辞》,《蠹窗诗集》卷十四,第20a—20b页。

⑦ 张令仪《梦觉关题辞》,《蠹窗诗集》卷十四,第21a—21b页。

至于《梦觉关》所本之《归莲梦》,应为署名“苏庵主人”者成书于清代初年的小说。该作讲述了女子白莲岸幼年为老僧收养,成年后创立白莲教,成为柳林寨首领,因寻思“英雄男子必要寻几个绝色美人取乐,难道我这个女英雄就没个取乐的人么”^①,女扮男装出外寻找“才貌双全”之男子,并对书生王昌年一见倾心,然昌年早有婚约,柳林寨最终也土崩瓦解,莲岸在老僧点化下恍然彻悟,从此遁入空门。白莲岸作为一位有胆有识、试图挑战男尊女卑秩序的女子,最终惨淡收场,姻缘、功业,尽成虚化。张令仪阅读这部小说后深有所感,并将之改编为戏曲,应是从莲岸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古代女子青史留名大多只能凭借人妇、人母之身份,无法如男性般施展才华建立功业,张令仪在古稀之年,将一生总括为“总误生平缘傲骨,但高人处只诗魔”^②,显示出睥睨须眉的张扬意气和对文才的自矜,这与《乾坤圈》《梦觉关》中“为娥眉生色”的女主人公形象是相通的。至于二剧中黄崇嘏“托以神仙”,白莲岸皈依空门,应是张令仪在现实中对女性身份的限制无计可施后,幻灭情绪的投影。

女诗人夏伊兰曾有“勿谓好名心,名媛亦不免”^③之语,才高志远的闺秀虽有显才扬名、建功立业之心,却囿于性别身份的限制难以如愿。女作家虽在戏曲中女扮男装、建立功勋,构筑一场超越性别角色的“白日梦”,一梦醒来,在现实中却无可奈何,只能以虚无的仙、佛作结,这是明清女作家戏曲创作中的常见套路。^④在王筠的《繁华梦》中,王梦麟梦中化作男身,不但高中状元、光宗耀祖,还迎娶了一妻二妾,梦醒后经麻姑点化,醒悟人生本为梦幻泡影。王筠之父元常称其“幼禀异质,书史过目即解。每以身列巾帼为恨”^⑤,剧中王梦麟“生非男子,不能耀祖光宗。身着裙钗,无路扬名显姓”^⑥的悲叹,也正是王筠及同时代才女们的心声。吴藻在《乔影》中托名谢絮才,自叹“生长闺门,性耽书史;自惭巾帼,不爱铅华。……若论襟怀可放,何殊绝云表之飞鹏?无奈身世不谐,竟似闭樊笼之病鹤”^⑦;为彰显女性文才而编写《名媛诗话》的沈善宝,也曾抒发过“投笔请缨空有愿,安能巾帼觅封侯”^⑧“造物于侬数太奇,凌云有志限蛾眉”^⑨的不平之气,并表现出“生不逢辰悲历劫,死虽易办惜无名”^⑩的才名焦虑^⑪。然而,相比借剧中人之口直抒胸臆,在多数女作家笔下,这种受性别制约的愤懑表现得较为婉约敦厚,如张令仪笔下“韶光如过隙,老我独无成”^⑫的惆怅感伤,是好名之心的不经意流露,也是女子无法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无奈喟叹。无论是对婚姻的不满、对文才的自矜,还是对困守闺阁难有所成的不甘,女性作品中的“言外之意”,只有联系其生平,并对文本作细致解读,才能深入领会。

结 语

当下的清代女性文学研究偏重江浙地区,且多强调才女个性张扬、言行放恣的一面——如结社

① 陈华昌、黄道京编《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第十七册《归莲梦》第三回“假私情两番寻旧穴”,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② 张令仪《七十一岁作》,《蠹窗二集》卷五,第12a页。

③ 夏伊兰《偶成》,《吟红阁诗钞》,蔡殿齐编《国朝闺阁诗钞》第九册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6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页。

④ 参见《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上编第二章“‘拟男’的艺术传统:明清妇女戏曲中之自我呈现与性别反思”。

⑤ 见《繁华梦》卷后王元常跋,华玮编《明清妇女戏曲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142页。

⑥ 王筠《繁华梦》第二出《独叹》,《明清妇女戏曲集》,第34页。

⑦ 《明清妇女戏曲集》,第251页。

⑧ 沈善宝《李云舫先生在清江见拙集 题诗寄赠 依韵奉答》(其一),《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二,民国十三年刻本,第3a页。

⑨ 沈善宝《呈张理庵六伯》(其二),《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二,第14a页。

⑩ 沈善宝《感怀》,《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二,第19a页。

⑪ 参见张宏生师《才名焦虑与性别意识——从沈善宝看清清女诗人的文学活动》,《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23—845页。

⑫ 张令仪《小恙》,《蠹窗诗集》卷五,第3a页。

唱和、拜师交游等,这虽然对“封建社会的女性是纯粹的受害者”这一“‘五四’妇女史观”^①起到了反拨作用,却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绵延数千年的传统女德有其深远的影响力,清代知识女性虽然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在思想及行为上出现一些偏离传统的新动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摆脱了女德束缚,也不能说明其有意识地试图颠覆传统女德。浙江闺秀、黄宗羲妻叶宝林“少通经史,有诗二帙,清新雅丽”,但她听说“越中闺秀有以诗酒结社者”,“蹙然曰‘此伤风败俗之尤也。’即取己稿焚之,不留只字”^②,这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女作家对偏离女德规范的言行不予认同的态度。即便历来被奉为引领了女性文学新风尚的随园女弟子群体,也并未否定传统女德。被袁枚誉为“闺中三大知己”的席佩兰在《小青》诗中写道“慢论本事属虚无,真有其人虑亦疏。解读牡丹亭上语,如何不解读关雎”^③,相比《牡丹亭》中的至情,她更倾向于《关雎》中温柔敦厚的女德;赠友人屈宛仙之诗中,又有“诗教从来通内则,美人兼爱擅才名”^④之语,可知她虽赞同女子显才扬名,但始终不曾摒弃“诗教”、“内则”。再如随园女弟子骆绮兰,虽驳斥了女子不宜为诗的言论,依据却是孔子删诗不废妇人之作,且强调师从的袁枚等人“苍颜白发”,拜师如同“瞻泰山仰北斗”,不存在任何男女之私,到了中年,更不禁“深悔向者好名太过,适以自招口实”。^⑤这说明清代闺秀普遍以传统女德约束自身言行,其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女德观念并不因舞文弄墨、师从男性而有本质上的改变。

其次,虽然清代对节烈妇女的褒扬不限桐城一地,但方苞、姚鼐等桐城文士撰写过诸多颂扬女性贞孝节烈的墓志铭和寿序,因而容易被推定为女性观念特别保守。加之目前桐城女性文学研究尚属匮乏,女作家中最广为人知者仍是身为节烈妇女的“方氏三节”,故而桐城女作家的生存及创作状态未能得到全面展现。本文通过列举张令仪作品,凸显了其思想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希望践行“举案齐眉”之德又不免“天壤王郎”之叹,有才名自矜又不敢明确表露,试图突破性别限制却终究无可奈何。事实上,即便“方氏三节”中的方维仪这一守节六十余年的“典型”女德楷模,也曾在《读苏武传》一诗中写道“从军老大还,白发生已久。但有汉忠臣,谁怜苏氏妇。”^⑥诗中自出机杼的视角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意识,也体现了桐城女作家在遵奉主流道德的同时,仍保留了思想的独立性。

综上所述可知,女性文学虽不免受周围环境尤其是身边男性的影响,但又有其独立性和独特性,女性固有的性别意识与传统女德根深蒂固的作用力,不会轻易为“开明”如袁枚者或“保守”如方苞、姚鼐者所左右。从张令仪的书写中,可以窥见她在“才女”与“贤妇”的自我定位中摇摆不定的尴尬处境,同样的精神困境在其他地域包括江浙的女作家身上亦有体现,限于篇幅,本文未能详细展开说明,但文中提及的王筠(陕西西安)、韩韞玉(江苏苏州)、骆绮兰(江苏南京,一说江苏句容)、朱静庵(浙江海宁)、沈善宝(浙江杭州)、叶宝林(浙江余姚)诸人皆证实了这一点。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摆脱偏见,不以地域作为区别女作家革新或保守的标签,也不因一些新风尚的出现而过分强调女作家思想及行为的变革,而是广泛稽考其生平资料,深入探究女性书写中隐藏的“微言大义”,才能更全面客观地展现清代女作家的生活实相和思想实态。

[责任编辑 闫月珍 责任校对 池雷鸣]

① 参见高彦颐(Dorothy K.)：《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绪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②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一,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54页。

③ 席佩兰《长真阁集》卷二,嘉庆十七年刻本,第11b页。

④ 席佩兰《闻宛仙亦以弟子礼见随园,喜极奉简》,《长真阁集》卷三,第1a页。

⑤ 参见骆绮兰《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

⑥ 潘江编《龙眠风雅》卷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chitectures in Song period ,and to disclose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hat Tang poetry has brought to the dual-artistic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landscape prose; landscape of the Song Dynasty; Material space; spiritual space

A Restricted View on the Contradiction and Dilemma of Qing Women's Self-Writing —A Study of Zhang Lingyi's Writing

QIAO Yu-yu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Qing women's writing have attracted many scholar's interests ,however ,by far most relevant studies often focus on women writers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 especially those famous ones such as the Five Writers of Jiao Yuan , Women Disciples in Sui Yuan and Bi Cheng Xian Guan. Those studies emphasize a lot on the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women writers' literary activities , such as forming literary associations , writing sponsorial poems , social interactions among friends and between disciples and teachers. On the other hand , women writers in Anhui have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By analyzing Zhang Lingyi's writing , this paper shows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ies of her thinking and reveals the contradictions when women tried to write about themselves ,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dilemma in which they swing between two personas: talented women and virtues women. This study tries to reveal the more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living situations of women writers in Qing dynasty , in hopes of supplementing and revising current women writers study , which put too much emphasize on Jiangsu and Zhejiang writers as well as the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their literary activitie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gentle women writers; self-writing; Zhang Lingyi

To Resist Abuse or Look for Another Way to Survive?

—An Analysis Based on Women's Divorce Lawsuits for Abuse in Beiping in 1940s

ZHANG Bei-bei

*the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Legal Document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collects a large number of marriage lawsuit archives of Beiping District Court of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especially of those who could not bear to be abused but suing for divorce in lower society. Analysis on these cases can not only help u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ases themselves , but also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se women's marriage , idea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rriage condition and the social chan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40s , in Beijing , while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marriage lawsuits by those women who could not bear being abused by their husbands to some extent reflects that the women's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had been awakened , however , the reason in the economic aspect behind the cases should also be emphasized. Although those women often looked like very poor because of being abused by their husbands , but the real reason for their divorce was not necessarily abused , it also might be a tragedy to make a living.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cal Court of Beiping; divorce; lawsuit; abuse